

中华文学通史

第五卷·近现代文学编

华艺出版社



张炯 邓绍基 樊骏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中华文学

第五卷·近现代文学编

近代文学

通史

华艺出版社

张炯
邓绍基
樊骏
主编

《中华文学通史》总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 炯	邓绍基	樊 骏	
编 委	王 飏	扎拉嘎	仁钦·道尔吉	
	邓敏文	石昌渝	刘世德	刘扬忠
	刘魁立	祁连休	严家炎	吴子敏
	张大明	连燕堂	陈晓明	杨匡汉
	郎 樱	降边嘉措	曹道衡	董乃斌
	蒋守谦	曾镇南	(以姓氏笔画为序)	
秘书长	董乃斌			
副秘书长	陶国斌	郎 樱		

近现代文学编编辑委员会

主编 樊 骏

编委 万平近 王飏 扎拉嘎（蒙古族）

邓敏文（侗族） 关纪新（满族）

关爱和 刘扬体 吴子敏 吴福辉

连燕堂 张大明 袁 进 黄淳浩

梁淑安 温儒敏

绪 论

在中华文学发展的长河中，从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夕，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的文学体系，包括文学的社会属性、阶级基础、理论观念、创作内涵、审美规范、形式体制，直到语言模式和传播方式等等，都逐渐发生并且完成了整体性的历史转换的时代。中国从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历届政权腐朽统治造成空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则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百余年间，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近代以来从资产阶级启蒙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这些新的文化思潮的冲突、交汇中，随着中国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逐步近代化，随着封建阶级分化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以及相应的社会思想、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经过几代文学家的文学变革、革命和开创性实践，绵延三千余年的古代文学体系，终于为崭新的现代文学体系所取代。从此，中华文学以新的形态出现于世界，纳入世界文学潮流，创造更加灿烂的历史。

这将近一个半世纪文学的历史，以五四文学革命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二十世纪后期形成的中国文学史学科结构中，它们分别称为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前后衔接，构成中国文学史上一次伟大转型的全部历史进程。

“近代”、“现代”^①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具有不确定性，只能根据语境判认所指，并会随着语境的历时性推移而变换。因此，有必要首先考察这一文学史格局形成和认识深化过程，以说明《中华文学通史》将近、现代文学合为一编的理由。

一九二八年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一九三〇年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最早分别以“近代”、“现代”冠名的文学史专著，但两书论述范围却基本相同，大体始于清末戊戌维新时期，以迄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分叙“新文学”与“旧文学”。说明当时新、旧文学有别，而近、现代文学未分。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都归入新文学家，清末诗界、文界、小说界革命到五四文学革命被视为前后相继的文学革命运动。这种“新文学观”代表了五四时期不少文学家基于亲身体验的共识。他们认为梁启超等是“现代文学之革新”的开创者，文学革命的“滥觞应该要追溯到清朝末年资产阶级意识觉醒的时候”。^②随着“新文学”的成长发展，三十年代后出现专门的“新文学史”著作。“新文学史”这一概念一直延用到五十年代初，但这时它已被确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因而断自“五四”，在此基础上形成“现代文学”概念。随后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文学划为“近代文学”。

五十年代末以后形成的这一文学史格局，主要是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依据的：“在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即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

① 就一般语义而言，“近代”、“现代”这两个词在汉语中并无严格区分，在英语等语种中甚至是一个词（英语：Modern）。

② 参见钱玄同《寄陈独秀》，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

四’以后，构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当时近、现代文学史专家对这一格局的认识基本一致且彼此衔接：“近代进步文学乃是从封建时代文学到现代新文学之间的一个过渡”，“它的反帝爱国和民主主义的基本主题”以及形式改革“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萌生作了必要的准备”；“但它本身无法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这个历史任务不得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肩上”；革命文学与人民革命事业血肉相连，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揭露、坚决打击，以及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向往，“是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别于近代文学的根本标志。”^①

实际上，这一文学史格局的形成、依据和基本认识中，已包含着可以将近、现代文学视为一个完整的文学发展历史过程的逻辑。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是对中国历史大时代的划分，只是指近代民主革命过程的两个段落。《新民主主义论》在指出这两个时期区别时，也多次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民主革命的基本性质和基本任务没有改变。就对文学事实的认定而言，呈现过渡状态的近代文学既非独立的文学形态也非完整的文学过程；它们未能完成的历史任务由现代文学来完成，也说明近、现代文学承担着共同的历史使命，并构成从开始到完成的序列；“五四”后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和坚决性以及领导思想固然有别于近代文学，但反帝爱国和民主主义的基本主题则一致。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开始并经历了由缓慢而急速发展的近代化进程。从龚自珍开始，到清末文学界革命，近代文学也逐步突破传统文学的思想原则和某些创作模式，进而文学体系各要素发生程度不同的变革，但未能全面完成这一变革。因而近代文

① 参见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近代文学”编《概说》与《小结》，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绪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学不是、已不可能只是古代文学的延续,也还不可能是如同欧洲资产阶级文学那样具有独立形态的“近代型”文学。它是一种转型期文学。中国文学的这一转型并没有在“五四”时期结束。新的文学革命是这一转型完成期的开始,但在这同时和在这以后,仍存在着中国文学向什么方向转换的问题,存在着以不同的世界文学为范型、从不同方面为新文学的建设和成长而进行的论争、斗争和实践。直到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由于抗日战争推动和革命形势发展,才在主要实践方向上渐趋一致并在理论上明确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属性和建设目标。因此,现代文学处于文学转型到基本完成的过程中。这两个时期文学变革的深度和广度存在重大差异,但变革方向却一致且衔接;文学表现的时代精神不同,却从不同侧面构成对近代意识的艺术把握;不同文学体裁的转换存在着时差,有些新体裁在清末已开始生成。戊戌至辛亥的文学是“五四”文学的“序幕”、“奠基”或“胎孕期”,而“五四”时期实现了比晚清全面、深刻得多的革命。当我们把近现代文学置于整个中华文学历史中审察,就更清楚地看到,近、现代文学固然存在着区别,而与古代、当代文学比较,就显出基本的共同性和变革的连续性。

近、现代文学的这种联系及其区别,都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特点有关。应当说明,在文学史断代问题上,简单地规定必须以社会史断代作为文学史断代,或者相反、简单地反对文学史的分期与社会史分期的重合,都是不科学的。文学活动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活动,在受社会历史支配这个总的隶属关系内,仍然循着“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并且“有自己的阶段”^①。它可能先于或后于社会而变化^②,也可能大致同步。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例如，中国近代社会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开端却是早于鸦片战争二十多年。

会历史分期可以作为一种参照，文学史分期只能根据文学自身的演变情况判断。但是，文学发生时代性变革的必然性，这种变革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却是由社会历史时代的转换决定的。因此，近、现代文学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我们把近、现代文学合为一编的理由，却是它们呈现出基本共同性和发展连续性的内在原因。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说明。

将近、现代文学合为一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运动过程的两个阶段来描述，这一体例更有利于展示文学体系转型的历史轨迹和最终指向，以及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文学的发展和基本特性。考虑到文学史学科划分的约定俗成，仍保留着“近代文学”、“现代文学”这两个概念。

二

中国近、现代文学是在一种特殊的文学史背景，特殊的世界历史、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发展的。认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生存环境，是理解近、现代文学的特殊性质、存在方式、发展道路和在文学史上的定位的基础。

一、近现代文学的文学前提与历史使命^①。

在漫长岁月、主要是在封建时代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已经逐步形成一个成熟、稳定、在自身范围内几臻完美的体系。但随着封建社会进入后期，这一体系由定型而趋凝固，除小说戏曲由于成形较晚且被置于侧翼而还能有一段发展繁荣时期外，构成古代文学主体的各文体都渐显停滞。延至封建末世，文化专制主义统治更成为窒息人的灵魂和束缚艺术创造精神的桎梏，其中也

^① “历史使命”这个词在这里并不具有先验模式或人为赋予的意义，只是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必然性的一种表述。

就包含了文学变革的自身必然性。当西方侵略打破了中国与世隔绝状态,剧烈的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冲垮了原有社会的稳态结构,世界近代文化的传入使儒家文化陷入价值危机,近代人文精神、民主意识和艺术自由观念与固有文学规范的冲突愈益尖锐,这一文学体系的全面变革便不可避免。

这一既定的历史前提,决定了近现代文学承担的历史任务。近现代文学随近代社会、民主革命发展的过程,也是文学体系各要素逐步发生、终至全面变革的过程。这种变革不同于古代的“通变”方式,是要逐步突破、以至冲决古代文学的思想规范、形式规范及语言规范,创造出新文学体系。

这一既定的前提也决定了近现代文学变革的艰巨性。不仅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和封建势力依然存在,也由于古代文学所拥有的辉煌、典范性、艺术上的完美,都构成巨大的引力场。挣脱这种引力需要外部社会变动的冲击并且激发为文学家思想和艺术革新的动力,也需要能量的积累以及另一种新的文学示范的引力,即使在冲破旧的规范以后,传统的艺术思维方式和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往往表现出历史惰性的作用。因此,文学体系的转换经历了一个开始缓慢、逐渐加速、能量爆发和重新结聚的过程,显示出由渐变到部分质变到突变和新质形成的运动轨迹。

但是,古代文学对于近现代文学并不只是一种保守力量。古代文学体系与古代文学不是完全重合的概念。虽然一些近现代文学家尚未认识和分辨这两个概念,因而提出过否定和打倒“古典”文学的口号或思潮,后人也曾以“打倒封建文化”或文学来概括文学革命性质,但近现代文学并不是也没有打倒全部古典文学或者说封建文学。古代文学体系在瓦解过程中和瓦解以后,各种艺术因素被分解择取。古代文学中包含的民族精神和渗透着民族精神的作品,曾被处在民族危亡中的近现代文学家一次又一次唤回来铸造国魂和诗魂;当近现代文学家们自觉地学习外国文学

时，他们的心理和作品中仍积淀着古代文学的艺术基因；而在新文学发展中“民族化”的提出更包含着自觉地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艺术经验的借鉴。不过近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继承革新。它的变革是全面的、根本性的，继承则是有选择的、深层的。

因此，近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次全面转型，但不是断裂，它们是中华文学史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学革命时代。

二、近现代文学的社会背景与基本特性。

中国在世界进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二百多年之后，才被迫与这个近代世界发生联系，并开始自己的近代史。鸦片战争以后百余年中，资本主义世界迅速扩大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与此同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兴起并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世界历史向新的时代发展。处在这样一种世界历史环境中的中国，经历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呈现为一种双向的历史运动。

殖民主义的侵略截断了中国历史的正常进程，中国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步步沿着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方向沉沦。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陷于被宰割、被掠夺，长期贫困、落后的深重灾难，甚至濒临民族危亡的最危险时刻。

但是，列强的侵略使中国历史经历了曲折，却没能改变世界时代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必然。中国人民在展开反抗侵略者和与侵略者勾结的统治者以“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①的同时，开始了中国近代化道路的长期探索，追踪世界史进程，不断以世界先进的社会制度为蓝本，提出各种改造社会和创建新中国的方案，并为之奋斗。这一斗争和探索从反对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已开始。近代化进程的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0页。

标逐渐指向发展资本主义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最后在现代社会潮流影响下，由现代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领导而完成，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从“师夷长技”到变法自强，从改良运动到革命斗争，从三民主义的建国方略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反帝反封建斗争本身就在逐步近现代化。同时，在最后胜利之前的每一次失败的变革和革命运动，都不同程度地在不同方面推动了社会进步，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一系列近代性的变革，虽然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前中国社会的面貌还不可能根本改变。

中国近代史这种双向运动的特点，对文学发展产生深刻的决定性的影响。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清王朝靠出卖国家主权换取苟延残喘。直到它被推翻之后，封建专制主义的幽灵仍附着在此后的统治者身上，封建经济仍然存在，封建意识对社会的渗透更是根深蒂固。这些是固守传统文学规范的文学流派长期延存、直至随清朝复亡而衰微的条件，也是各种封建主义或专制主义的文学思潮、文化政策的基础，并成为文学变革的外在阻力和内在重负（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说也是文学中反封建主题贯穿始终和强化、深化的原因之一）。

然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文学的主潮却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学。这是在文学属性与社会性质关系上，近现代文学与古代、当代文学的显著区别。构成近现代文学主要基础的，正是推动中国向近代化方向发展的历史运动。由此形成了近现代文学的基本特性。

首先是近现代文学主潮的反帝（反殖）反封建民族民主主义的基本性质。近现代文学主潮与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发展和探索救国强国道路的历程，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许多文学家本身就是寻求救国道路的先行者，他们的作品是他们

自身、也代表了一个民族觉醒的精神历程；也不仅仅表现在反侵略战争和革命运动高潮时期文学自觉地直接地呼应，成为全部可歌可泣的斗争历史和它所激起的感情波澜的艺术记录；这种联系要广泛深刻得多。对侵略者瓜分阴谋和暴行的仇恨和控诉，对统治者卖国行径、腐朽现象的讥嘲鞭挞，对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反思和批判，对人民遭受深重压迫、灾难和精神桎梏的深切关注，对近代文明、民主共和与社会主义前途的向往，对民族历史的追忆、对多难祖国的热爱和新中国理想的追求，都渗透着随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而成长和深化的近代民族、民主意识。同时，近现代文学也反映和表现了这种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成长相联系的社会意识各方面（人生价值观、伦理观等等）的变化，和在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动下各阶级、各阶层的社会地位、生活道路的变化。

其次，推动中国历史向近代化方向发展的各种社会力量，也是推动近现代文学主潮发展的力量，因此近现代文学是多种成分的统一。从纵向看，从士大夫中分化出来的具有初步近代意识的文学家、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文学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曾先后是不同时期文学创作的主力或文学运动的主导。而无论近代文学或现代文学各个时期，又都包含着不同阶级、不同倾向的多种文学成分。它们的统一性在于：构成近现代文学主潮基础的，主要是与新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各个新的阶级；反帝反封建和救国强国这一共同的时代主题贯穿全过程；文学主潮的发展最后统一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方向。

再次，近现代文学呈现为一种非稳态性。一方面，文学主潮的形成和发展与传统文学体系，首先与是这一体系中体现其封建意识形态性质的“道统”、“诗教”等创作原则和政治伦理规范，进而与形式体制和语言规则，发生愈益明显的冲突，形成晚清与“五四”两次文学革命。另一方面，文学主潮随着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而发展，并随着社会某些方面（如阶级结构、教育、文化和

传播方式等)逐步发生近代化变革而不断自我更新,因受传统文学体系约束程度和新因素发展程度不同而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在不断的变革和创新中运动,正是转型期文学的特点。

三、近现代文学的文化环境与时代走向。

中国步入近代的时候,正是马克思所说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财产,形成一种世界文学的时代^①。中国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并卷入世界市场后,西学东渐,中外文化交汇、冲突,成为近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但是,近代中外文化关系不同于古代那种与社会发展阶段相近的东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不同于一般意义的以固有的本位文化为基础,借鉴吸纳外来文化以丰富自身。近代中外文化的冲突,不仅仅是由于地域性、民族性差异,本质上是落后、衰朽的封建文化与先进、成熟的资本主义文化和更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性差异。因此,中外文化,包括中外文学关系的基本趋势,是中国人由被动输入到主动引进世界先进文化以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改造,吸收世界文化并进行创造性转化,以重建新的民族本位文化。这一输入、引进入过程还受到三层矛盾制约。首先,西方文明是随着侵略者大炮开始传入的,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救国的需要,制约着中国人对“西学”的选择。其次是一切异域文化间必然存在的民族性的差异。这种民族性差异在传统仍占据重要地位时可能形成保守机制,而在民族自我更新中可能形成对外来文化的转化机制。最后它还受世界文化本身发展的影响。当中国还未能充分吸收西方资产阶级近代文化时,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尤其是在苏联的发展,已形成与资产阶级文化相对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些矛盾作用下,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最早觉悟到应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其中所说“世界文学”指广义的“文学”,即精神文化产品,包括但不专指艺术性文学。

该师夷的中国人，首先从反侵略（“制夷”）出发选择了“长技”即科学技术。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传统文化为本位吸收西方科技文化，未能动摇“道”的地位，但由此开始的西学东渐，已部分地影响了作家的文化视野、知识结构和作品的文化品格。甲午战争的失败也证明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失败，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运动兴起后，先进的中国人以“冲决网罗”的勇气，“尽变西法”的热情，从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中寻找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和强国方略，推动了西方文化的大量输入。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旧学”与“新学”的剧烈冲突是这一阶段重要特征。此期中国人主要选择的是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和十九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学说，影响最大的是《民约论》和《天演论》。资产阶级近代文化对传统文化造成空前的巨大的冲击，但是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政治路线，革命派排满复汉的狭隘民族主义，妨碍了他们彻底地冲决封建文化。真正导致中国文化根本性变革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一场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打倒孔家店”即反对封建思想的文化革命运动，明确提出了创造新文化的目标。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的中国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新曙光，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新的方向。“民主”已不限于新兴的资产阶级而扩大到以“劳农”为主的人民民主；“科学”也不限于自然科学，同时也指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科学。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以世界先进文化来根本改造并重建中国文化。此外还有两个相伴随的特点，一是西方二十世纪文化几乎同期输入，资本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学说，以及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等杂沓而来；二是西方学术文化与艺术文化从此时开始大量涌入。因此，“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也受到世界文化矛盾的影响，在确定建立新的学术、艺术文化的同时，从一开始就面临建设什么样的新文化的新的选择，由此引发了不同的方案与不断的论争。

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总结了近代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的历史经验与特点。他一方面指出近代中国文化已经属于与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相联系的文化，属于世界近代以来文化的一部分，揭示了鸦片战争以来文化“近现代性”的本质。另一方面又指出“五四”以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它既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的文化，也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于是，中国文化进入在这理论指导下，建设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文化的新阶段。

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经历了大体相近的、连续的变革、发展过程。在中外文化冲突和中国文化更新、重建这一环境中生长的近现代文学，既表现出与世界近代文学以至二十世纪世界现代文学的“同趋”和“趋同”，又具有自我更新中的民族文化的特性，最后以新民主主义文学的身份走向世界。

三

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主义文学主潮的发展，和文学体系的全面转型，是贯穿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中国文学的两条互相交织的基本线索。这两条线索的发展过程都以五四文学革命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即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时期。每个时期又分为若干阶段。

近代文学包括两个基本阶段。十九世纪中、后叶，古代文学体系发生裂变，出现新变与衰变两股发展方向不同的文学潮流。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以其揭露批判封建“衰世”本质和专制统治、呼唤精神解放和改革风雷的诗文，开启了一代文学新风；他和魏源启导的经世文风，影响了一批人，并从讥时议政向倡言“师夷自强”发展；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潮已初具近代爱国主义特征；部

分传奇杂剧也出现同类变化。诗风、文风的新变，标志以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和反对腐朽封建统治、救时自强为主题的近代文学主潮开始形成。至七八十年代，随着西学东渐和中国人走出国门，文学主潮中“变法自强”主题进一步深化。伴随文化传播方式近代化而产生的报章政论，以及出国游记，表达了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的倾慕，在中西对比中，发出“借法自强”，“振工商”、“立宪法”的呼声，反映了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要求。此期文学新变潮流，以经世救时为契机，使文学转向现实从而随时代而变化，在创作实践上由载道明理转向“务恢新义”，并不同程度地突破了“义法”藩篱和“怨而不怒”的审美规范。这股向着反映时代、变革文体方向发展的潮流，成为晚清文学界革命的前奏。与此同时，各种传统文学流派仍颇有声势，并且也在“因时而变”，寻求出路，或经自我调整而一度中兴、复兴。但终因恪守“道统”、“文统”、“诗教”，坚持崇古、学古方向，或依附日趋势没落的封建统治，陷于无法摆脱的矛盾而渐趋势衰微。是为第一阶段。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兴起一场由资产阶级倡导的文学界革命运动。这场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由改良派和革命派共同推进、并由革命派进一步发展的文学变革运动，大体经历诗文变革的探索——文学革命的倡导——革命文学兴起——革命文学落潮这样的发展过程。戊戌变法以前，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的“新派诗”、“新学诗”、“时务文体”和提倡小说，都还属于为宣传维新变法、开通民智而在实践中摸索文体的解放。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从变法失败教训中认识到改革必先启蒙，于是总结前一阶段探索经验，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曲改良的口号与一系列具体主张，其核心是“文学新民说”，主张用诗、文，尤其是小说来“新一国之民”，实质是进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由于文学界革命的号召具有思想启蒙性质，因此不仅得到维新派，也